天下秩序和儒教普遍主义的重组可能性[[1]](#footnote-1)

赵京兰（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

1、引言：“天下秩序”的重组可能性和“另外的现代”想象

中国成为G2的显著的地位变化使得我们只有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中国是什么”。可以说“中国”所具有的某些因素与未来的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天下秩序”的讨论也得以在中国的崛起打开的想象空间中展开。这是因为以下三方面因素。第一、中国的规模。中国绝不是一个国民国家，而是“帝国规模的国民国家”。第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规模问题结合在一起，其影响力巨大。 第三、一直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不同于西方的“天下”，即一个“价值体”。[[2]](#footnote-2)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不同结合方式会带来不同结果，但在预测21世纪的中国内部和世界秩序时，这一结合体必然是最大变数。

本文密切关注中国的上述状况，主要针对第三个问题，将“天下”概念的重组可能性联系到“另外的现代”（multiple modernity）想象，去加以讨论。也就是说，本文的叙述不排除根据“天下”概念的重组与否，形成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秩序的可能性。本文还将主张，若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必须反映“20世纪中国的经验”，不管是以哪种形式。

“天下秩序”不仅是以儒教的王道思想为核心的世界观，而且包含经济发展和运作方式在内的中国固有机制。尤其中国拥有着意识形态领域——上层结构和经济领域——下层结构没有完全脱钩的整合型传统。汪晖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3]](#footnote-3)如果他的这一观点也适用于中国，那么我们有必要以21世纪的重组为前提，让如上的中国整合型传统自觉复活。当我们讨论“另外的现代”时，重新提及“中国”这一“天下”，就是因为中国所具有的这种历史传统。

不过有一点我们不能遗忘，那就是面对“危机的世界现象（global phenomenon of crisis）”，重组天下秩序绝非易事。因为有人曾分析说，中国的国家资本与全球的私人资本不同，它具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实践和性格（ethos），但中国的国家投资者没有能力颠覆处于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也丝毫不关心用什么取代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问题。[[4]](#footnote-4)平息这种担忧，需要一定时间，但首先应该让人们看到，习近平时代的核心项目——“一带一路”缓解中国内部的不均衡的可能性。[[5]](#footnote-5)在此基础上，从实践的角度展现出，“一带一路”可以创造出欧亚经济合作的转折点。我们要这么做的原因有两点：内部逻辑和外部逻辑不能分割开来；这样做能够呈现，天下秩序论述不会只停留于口号，可以凭借实体性内容去展开。

天下秩序的重组问题当前与重思中国的问题有所重叠。在中国，西方现代具有接受和抗拒的双重意义。为了生存需要接受，而为了守住自己需要去抗拒。持续150年的“洋务”意味着，为了救亡不得不要去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洋务可以说是 “被强迫的现代”。但如今已经摆脱了“洋务”的强迫性，进而走到了重思中国的关键的时刻。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思考的对象，即中国，不只是传统的中国，也是具有社会主义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中国。也就是说，20世纪的中国与传统的中国一样重要。天下秩序和儒教的普遍主义重组问题，和对20世纪的解释并不是毫不相干。21世纪的创新要以前面所说的中国具有的三种传统和20世纪的经验为基础。

本文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参照中国传统时期的“支配的正当性”问题，去思考“天下秩序”和儒教普遍主义的重组可能性。同时就儒教伦理的在当代的重新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和正当化战略，积极反映和讨论当前中国“大陆新儒家”的论述。重新确保儒学的普遍性，和天下（或帝国）秩序[[6]](#footnote-6)的重组可能性，密切相关。但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中国儒学论述和天下论述进行逻辑性的缜密的研究。因为，目前中国的儒学论述有着不能只用哲学范畴覆盖的“政治考量”。本文将在天下秩序的重组构想中呈现出作为东亚人的自我认同，而笔者将尽可能在论述中承担打破中国内部同一性的作为他者的作用。

1. 本论文最先在PEKING UNIVERSITY BERGGRUEN INSTITUTE RESEARCH CENTER(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主办的第一届国际大会（“什么是天下- 东亚语境“2018年6月17日-18日）上发表，之后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footnote-ref-1)
2. 列文森认为, “天下”就是“中华帝国”, 亦即“世界”。同时, 他又指出相对于作为“权力体”的“国”, “天下”是一个价值体。列文森（郑大华、任著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footnote-ref-2)
3. 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变-与全球未击中的台湾问题》，《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第70页。 [↑](#footnote-ref-3)
4. 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New Left Review 89 Sep-Oct 2014, pp. 63-64 [↑](#footnote-ref-4)
5. 最近在中国，人们将中国梦和一带一路视为“新时代”新天下秩序的核心。 [↑](#footnote-ref-5)
6. 如果说“天下秩序”是意味着中国机制的复杂概念，那么在最近的语言环境中，“帝国”或许是能反映现实的用语。但可能因为“帝国”会被误解为帝国主义，因此中国主要使用”天下”，而不用“帝国”。在儒家的立场上，也更应该叫“天下”（论）。但这篇文章根据脉络，两个都会使用。 [↑](#footnote-ref-6)